

## IBE：中国野生影像狂人集结号

IBE 创造了一种新的摄影行动：集合一帮具有深厚博物学背景的自然摄影师，各司其职、交互式拍摄，360 度立体还原一个地区的生态多样性。他们受政府、企业和科研机构委托拍摄，自食其力，持续填补中国野生影像的严重缺失。

文|Yeti

### 中国野生摄影师，另一个濒危物种

3 头雪豹在曲麻莱的山垭里嬉戏，它们住在中国青海省玉树，海拔 4500 米的藏区。这种有着优雅斑点和曲线的大型猫科动物，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产物，如今进化成地球上最美的高山兽类。法律将它列为濒危物种，乐观估计，地球上不超过 5000 头。此刻，它们懒懒伸开其特有的梅花状脚掌，踱着长达 1 米的步子，高兴起来，随时准备一跃跳过 15 米宽的山涧。

一股陌生气息进入感知范围，雪豹警觉起来。1 万米之外，另一群“濒危物种”正在缓缓靠近——野生动植物摄影师。事实上，他们的生存状况与雪豹不相上下，一点儿也不轻松。这是一群沉迷于兽类、鸟类、昆虫和花花草草的“博物学家”（Naturalist），在成王败寇的现代社会，他们想尽办法琢磨出一套能让人心甘情愿买单的办法——好支撑他们持续不断地深入人迹罕至之地，拍摄让他们足以疯狂的中国野生世界照片。他们期望“用镜头保护野生物种，记录和展示中国生物多样性。”

他们干得不错。5 年过去，这个名为 IBE（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，ImagingBiodiversityExpedition）的社会企业，深入梅里雪山、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、三江源等区域，受政府、商业机构、NGO 和科研单位委托，对中国 31 个地区开展 40 次野外调查，拍摄图片近 30 万张，记录中国野生生物物种近 6500 种。

眼尖的董磊最先发现雪豹，他擅长拍摄鸟类，能通过叫声判断鸟的种类。一行人压抑住兴奋，屏气凝神下车，围着一只雪豹拍。足足半小时后，摄影师们才发现，自己被凝视了。“其实，你什么时候靠近、在做什么，动物完全知道。被它们观察，感觉很幸福。” IBE 队长徐健擅长拍摄兽类，他的典型思维方式是，把自己假想成被拍摄的动物，猜测其心理和行踪，等上 4 小时到 6 天，静候最佳时机。

### “你认识几种中国野生动物？”

徐健决定用这个问题考考我。眼前展开 8 张照片，我认出了大熊猫、金丝猴、牦牛和雪豹，另外 4 种则面目陌生，据说，它们是藏狐、赤斑羚、藏羚羊和喜马拉雅旱獭。“中国人熟悉长颈鹿、大猩猩、河马，对非洲生物的亲切感远远大于自己国家的野生动物。”在 IBE 创始人徐健看来，这是一个社会问题。“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，位列北半球第一。可是许多动植物，连一张清楚的照片都没有。公众不认识、不知道，谈何保护？”

更严重的是自然保护区的影像空白。徐健曾在某著名自然保护区，请其出示保护区的生物内容，对方拿出一个纯文字表格，表格制作时间：1956 年-1978 年。“很多特有物种，我们还没来得及了解和研究，就已经消失。”

这一块的认知空白，徐健将其归结为“优质影像（Good Information）的严重缺失”。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，《国家地理》（National Geographic）杂志在全球销量高达 1300 万份，催生一批顶尖自然摄影师的诞生。他们进入非洲、南美，潜心拍摄，影像作品在全球广为传播，一批野生动物形象由此深入人心。而中国，始终是一片处女地。

徐健在大学时，担任著名大学生生态保护社团山诺会的副秘书长，他早早确认了自己：成为一名专业野生动物摄影师。在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杂志工作 6 年后，他参与了 BBC 与 CCTV 合作的自然纪录片《美丽中国》，随后加入由中国著名自然摄

影师奚志农创办的环保组织“野性中国”，负责影像库筹建工作。

“野性中国”几乎聚集了中国最棒的自然摄影师，但徐健发现他们生存不易，几乎没有人可以只依靠摄影作品生存，成为全职摄影师。“中国并没有健全的生态支持摄影师产出好作品。”徐健作了一个简单的对比：国内杂志给一张跨页照片的稿费至多为 2000 元/张；美国媒体之间抢图片，稿费在 300 美元至 1000 美元/张不等。徐健了解到，顶级摄影师一个操作周期 2 年的野外专题，可以拿到约 25 万美元的预算，“有一次我瞥到一位国外同行的小本子，费用清单里有一栏：租直升飞机。”

怎么打破窘境？只有解决生存问题，更多直指人心的生态照片才会涌现。2008 年 8 月，一篇美国《国家地理》的文章，启发徐健开始创新。

## IBE 召集令

“那种感觉就像，你看着一群深深崇拜的英雄，各显神通，聚在一起演一出好戏。”徐健看到的这篇立体报道，由 ILCP（国际保护主义摄影师联盟）联合《国家地理》杂志，邀请 4 位一流野生动物摄影师（Tim Laman、Joel Sartore、Christian Ziegler 和 Ian Nichols）和一位专业生态作家，一起深入西非赤道几内亚的 Bioko 小岛，进行了为期 3 周的生态摄影调查，“每人领域不同，各有分工，有趣又高效。”

“也许可以做一个企业，拷贝这种模式。”2008 年，徐健数了数手上的“狂人”，创办 IBE，开始招兵买马。

“IBE 挑选摄影师的第一标准：他是不是一个狂热的 Naturalist（博物学家）。除了摄影技术，他需要具备相当专业的生物学素养。”IBE 目前团结的近 30 名外围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，他们是商人、大学教师、设计师，同时是两爬专家、鸟类摄影专家、昆虫专家、植物专家、人类学博士……

现在，徐健每接到一个项目，会发出召集令，就像美国大片里，某位想干票大买卖的老大，给同党打电话，身怀绝技的同党们从全球各个角落迅速起飞，聚在一起大干一票。切换到 IBE，他们从成都来的鸟类专家董磊，从北京来野生鸟类资深摄影师郭亮、植物学硕士王辰，从香格里拉来藏族摄影师彭海生等等。八方好汉汇集，方能开工。

事实显示，集合式工作极为高效，全国各地保护区喜欢这种 360 度立体还原某地生物多样性的工作方式。

2009 年 6 月至次年 5 月，IBE 受委托，进行长达一年的梅里雪山拍摄项目。梅里雪山是世界自然遗产“三江并流”主要景观之一，是著名的雪山群和藏区深山。然而人们对于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了解接近空白。

徐健进行详细部署，分别在春夏秋冬四季，组成 4 支考察队伍进入拍摄。最终，大自然保护协会等机构联合出版的《梅里雪山自然观察手册》里，记录了涉及真菌、植物、蜈蚣、蜘蛛、昆虫、两栖动物、爬行动物、鸟类和哺乳动物总计 413 种；书中还包括根据拍摄经验所得的梅里雪山 13 条自然观察路线。

## 野生摄影的科研气质

与自然摄影师不同，IBE 的照片带有浓厚的科考性质。“IBE 认为，摄影具有审美和科学取证的双重属性。国外有博物学传统，达尔文随军舰远行，会带上几位画师，随时画下物种样貌。今天的野生摄影师，相当于当年的画师。”

徐健为 IBE 赋予了新鲜的科研气质。每张照片，都有详细的数据可供使用。比如精确的 GPS 坐标记录；比如精确统计的动物数量，2009 年，在梅里雪山遇见大紫胸鹦鹉群，摄影师在 Photoshop 上逐个数，统计出 1500 只的精确数据，之后被权威专家指出，这是有记录以来，近 30 年此地区出现的最大规模越冬群。拍

摄同时，他们还进行物种鉴别，动物的行为分析等。项目结束后，他们还会向当地保护区提交一份环境评估调查报告。

IBE 收获的珍贵影像资料，令其在科研领域的权威性越来越高。

2008 年，他们在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，重新找到了 30 年前科学家发现时就已数量稀少、一直缺少研究的务川臭蛙；2010 年，在云南老君山发现中国特有物种白点鹏的新栖息地；2011 年，在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首次拍摄到被称为“昆虫活化石”的墨脱缺翅虫，并在河谷里发现了黄腰响蜜鸫，而此前，专家认为这种鸟只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南坡……

“IBE 诞生的背景，是中国急速发展 30 年，自然资源被严重消耗之后。”徐健越深入无人区，越能看见生态的直接受害者。“动物行为里有一个词叫 Shame（羞涩）值，动物遭受越多来自人类的威胁，Shame 值越高。”IBE 摄影师们看到的中国野生动物，基本非常怕人。

徐健相信影像的力量，希望以它作为链接科研、保护区、公众和政府之间的桥梁。

“生态就像一面砖墙，每个物种是一块砖。当我们不停往外取砖，总有一天，这面墙会倒下。而人类，不过是砖墙里的一块砖。”